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浩然研究

Hao Ran Yan Jiu

任玲玲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项目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Hao Ran Yan Jiu
浩然研究

任玲玲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浩然研究/任玲玲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650-2568-6

I. ①浩… II. ①任… III. ①浩然(1932~2008)—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6220号

浩然研究

任玲玲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92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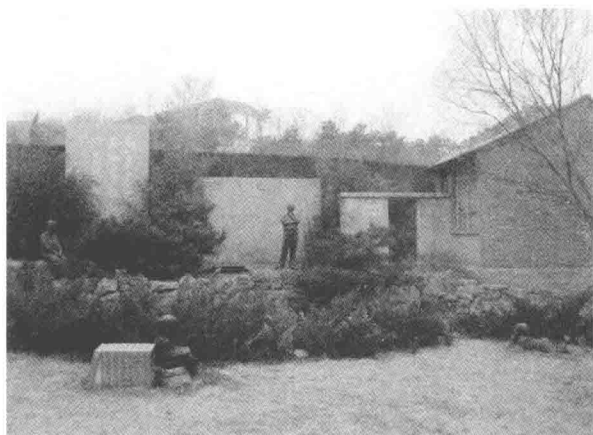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50-2568-6

定价:5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浩然青年时期的照片



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墓地前浩然的代表作



1975年浩然与农民在一起



《金光大道》海报



上世纪 70 年代浩然带着小说《金光大道》的手稿向农民（人民公社社员）征求意见



《艳阳天》连环画

总 序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起，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名改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所获得的真诚。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次年我开始招收学生。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29种著作，预计今后几年内将达到50种左右的规模。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不论这一个

案有没有价值。

回顾招收博士生以来的教书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我的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年龄大小、从事过什么工作，他们为了读书求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坦诚相处，教学相长，虽然也会有艰难或者隔阂，但毕竟能够获得一些理解与成长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曾对同学说过，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痛苦，追求理解而不追求怨恨。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在同学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这里，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拥有传统人文的深厚资源、外来学术的精彩信息和百年老校的丰富积淀。它们浩如大海，蔚为壮观。也许，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师道与学统的交汇，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才是他们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学习的主要成果，也是当代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导同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知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完整过程。对老师来说，同学的敏锐、勤奋与活力，是那么的宝贵；对于同学来说，每一类学术题材的发现，每一种学术思路的开拓，每一个细节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学问启蒙和心灵震撼的作用，甚至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新认识。20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开辟了各自学术领域的新境界。它告诉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根本标志，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及其所包含的开拓性成就。有鉴于此，我们才应该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要求所有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许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李良玉

2011年8月30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纠正政治化写作的错误倾向

——《浩然研究》序

这是我第二次为任玲玲的书写序了。第一次是2004年12月为她的那本《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创作道路》，至今已经12年。那一次，是她的硕士论文；这一次，是她的博士论文。为了写序，我再次读了书稿的清样，最大的感叹是时光荏苒，日子过得太快了！

任玲玲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现在书名改成了《浩然研究》。做这样的改动是我的意见，我想读者一定能够理解。

我对任玲玲的论文，曾经有过如下的介绍：

任玲玲同学的论文，叙述了浩然生平的主要经历，梳理了他的全部作品，分别研究了浩然早期创作阶段、“文革”时期、“文革”之后的改革时期、浩然的晚年阶段评论界对他的看法，从“政治化写作”这个角度，研究了浩然的创作宗旨和手法。通过研究浩然的全部作品，阐述了他的创作思想；通过分析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揭示了他的创作原则；通过分析极“左”时期的时代氛围，清理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浩然：他是一个通过文学创作宣传极“左”意识形态而越搞越红的作家；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完整地实践了“政治化写作”的错误方法；他通过艺术人物高大泉所塑造出来的高度政治化的“高、大、全”形象，成了一种代表“假、大、空”社会丑恶的当代艺术符号。作者的分析，实现了对他的批判，提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成果。

研究浩然是我指定的课题，其目的，“是从‘政治化写作’这个角度研究浩然的创作活动”。“政治化写作”是浩然作品的最大特色，也是截至“文革”结束为止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所以，任玲玲的这本书，为我们认识浩然、认识当代文学、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一份有益的借鉴。

对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注意，至少可以追溯到18年前。

1998年11月18日，我应邀为南京大学的学生做了“当代文学的非意识形态

化趋向”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第一，意识形态对文学有影响。任何一个作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一定影响，严格说来，丝毫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作家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一）任何作家都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而这个环境必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环境；（二）作家所表现的人们社会生活本身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包括作家本人的生活，也处在意识形态的网络之中；（三）任何作家和他的作品，都存在一个对意识形态认同或批判的问题，不论你是否承认“文以载道”，你总有一个“道”。作家的作品总是“作家之道”和“社会之道”的互相比较、互相评价。以上三个方面的影响，不可能不反映到作家的作品中去。

第二，文学不等于意识形态。我们说意识形态对文学有影响，是从文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与意识形态有一致性、作家所体验的社会生活本身含有意识形态因素、作家出于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意识形态有肯定或否定的角度上说的，丝毫不说文学等于意识形态。它们的区别在于：（一）文学的基础是生活，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政治；（二）文学是对生活的艺术反映，意识形态是对某种观念形态的政治肯定；（三）文学是作家个人的精神产品，属于文化艺术的范畴；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的政治规范，属于国家上层建筑；（四）国家保护作家的著作权，但是不限定作家的文学观念，不干预文学作品的内容，更不以法律制裁作品内容中虚构的反社会事实；意识形态受国家保护，任何构成犯法的反社会的政治行为或刑事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因此，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把文学直接纳入政治并且通过意识形态渲染所实现的文学作品中过度强化的政治图解和道德说教倾向”。18年前提出来的这个定义，当然是正确的。可以说，研究浩然的政治化写作，是对长期流行的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现象的最好的典型解剖。

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我持严肃批评的态度。我曾经说过：

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革命时期为适应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或者忽视文艺价值和艺术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浩然的政治化写作，是1950年代以后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是长期反传统、反文化、反现代化政治运动的产物。

今天，需要进一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总结政治化写作的深刻教训。

第一，政治化写作是政治培养的结果，它不会仅仅在文艺领域被作家们运用。换言之，在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各个领域，都会被人利用起来以获得



额外的利益。于是，其后果必然是取消主义的。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阅读一篇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这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当阅读一本历史书的时候，第一感觉是，这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宣传；当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第一感觉是，这不是小说而是政治宣传；当收听一首歌曲的时候，第一感觉是，这不是音乐而是政治宣传。于是，所有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各个领域的作品，都充满了政治说教，而与人类文化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

对于读者来说，这将把一代人的被欺骗的感觉不可化解地培养起来，从而对社会的公信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第二，承认任何社会都存在意识形态系统，并不是说所有社会都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所谓社会，只是生活于一定环境，包括种族、地理、文化、国家诸传统因素所延续的特定条件中的人们，所自然形成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客观场所。生活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政治只是影响生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对于老百姓来说，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永远是最重要的，不需要把他们都搅到政治里面去；反过来说，管理社会的根本方法，是确保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而不是意识形态说教。

一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社会是得民心的，这是政治最坚固的基础。

第三，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行政当局的政治管理，但是，就现代法治国家来说，它的政治管理一定是现代法律系统的全面管理，是执法机关依据法律纠劾包括行政当局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违法行为的常规化管理，而不是行政当局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垄断式管理。现代行政管理所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从实施效能上说，必然是“小行政，大法治”。从这个意义上看，个别理论工作者常常有意无意地散布的意识形态恐慌，不仅具有无病呻吟的性质，而且间接反映了某种政治不良、法治不彰的现象。

法治的社会是坚强的，人治的社会是脆弱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第四，任何社会都存在个体自由和集体效率之间的矛盾。这两者的关系具有互相排斥和相辅相成两种不同的性质。个体自由越充分，社会活力越大，集体效率越高；相反，个体自由越缺乏，社会活力越低，集体效率越差。因此，用法治的思维，通过法治的方法和途径，实行对社会的文明管理，恰恰是实现政治清明、建设政治文明的不二法门。

通过浩然这个个案，可以深入思考很多问题。

要了解对浩然及其作品的卓越见解，读者还是读这本书吧！

李良玉

2016年3月21日上午8点—10点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

“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剖析：

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精心结撰故事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

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走



来,他有着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去自觉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条件以及作家自身的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

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将写作主题定为歌颂的党的文艺战士,浩然用虚幻的政治符号来遮蔽现实社会的矛盾,在创作上阿谀和迎合政治,完全失去了作家的独立意识。

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今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浩然 政治化写作 当代文学 阶级斗争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研究现状	(4)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7)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20)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20)
第二节 为谁写作	(26)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33)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33)
一、从孤儿到户主	(33)
二、宣传干部的培训	(41)
三、记者生涯	(46)
第二节 作家梦	(51)
一、文坛崭露头角	(51)
二、一张“作家证”	(53)
三、从《红旗》杂志社到北京市文联	(56)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58)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58)
一、主要作品集	(59)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61)
第二节 创作经验	(70)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70)
二、浩然的创作公式	(73)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76)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76)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79)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83)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83)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83)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88)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92)
一、《艳阳天》的主要内容	(92)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95)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98)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103)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103)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104)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描述	(111)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118)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119)
二、“文革”后的评论	(126)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132)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132)
一、《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	(132)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137)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141)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141)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145)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149)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149)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154)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160)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演绎	(162)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162)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164)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167)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167)
二、“文革”后的评价	(174)
第六章 浩然“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创作	(180)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180)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180)
二、“文革”中的两桩公案	(186)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197)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197)
二、《西沙儿女》的内容与特色	(202)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的创作与修改	(206)
一、《百花川》的内容	(206)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207)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209)
一、对浩然作品的评价	(209)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216)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遇和文学活动	(218)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218)
一、“文革”后的经历	(218)
二、“文艺绿化”工程	(221)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225)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225)

二、主要作品·····	(227)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235)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238)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238)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240)
第三节 语言特色·····	(253)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261)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261)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271)
附录1 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288)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郑 实	(299)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309)
参考文献·····	(317)
致 谢·····	(325)



绪论

一、选题缘起

“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这一选题，是在我的第一个博士论文选题停滞不前时，导师李良玉教授给我拟定的题目。

2002年7月，我从李老师门下毕业，取得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此后，曾有人建议我以后读博士换个导师，以利于自己在历史系的发展。但从本科读书到毕业留校工作，我和李老师不论是师生关系还是同事关系，都相处得非常愉快。李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简单但有原则性的生活理念深深感染了我。后来，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我决定还是继续师从李老师研习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2005年9月，我重投李老师门下，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博士学位一读就是八年。

2006年的6月，博士入学快一年的时候，李老师就给我定下了博士论文的題目：“文革前十七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这一选题具有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相结合的性质，不论是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还是经常性学术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但由于该选题难度较大，材料比较分散，再加上我平时工作烦琐、家事纷扰等原因，自2007年1月完成了开题报告后，论文的进展非常缓慢。

2008年6月，李老师约我和一位博士后师兄在龙园小区一家茶馆喝茶，专门动员我更换博士论文选题，他说“文革前十七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这个选题确实有一些难度，恐怕很难按期完成，建议我赶紧换题。李老师问我，能不能做一篇关于浩然的博士论文。

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来说，浩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对于他，我只知道有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其他都是一片空白。李老师耐心地说服我，这个选题与我原来的选题有一定联系，并与硕士阶段的研究领域相关，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浩然是20世纪60年代“文革”文学的代表，“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浩然就是那一个作家。“文革”时期，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大

